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温世亮

(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江西南昌, 330032)

摘要: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 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 以宋学为尚, 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 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 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 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 “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 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 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关键词: 姚鼐; 乾嘉学风; 诗学观点; 诗歌创作; 学问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1-0211-06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 可谓汉学风从, 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 这一学术风潮也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诗歌领域, 诗学观点和创作的学问化已然成为时下诗坛的一大风会。时人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其所云“只觉诗流好尚偏, 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 长短皆摩击壤篇”^[1](卷三)], 正是这一境况的实际反映。而不断蔓延扩张的翁方纲“肌理说”, 以厉鹗为代表的以“书为诗材”的“浙派”, 则可以视作其中之典型。姚鼐既是乾嘉时期的一位重要学者, 也是乾嘉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 他的一生, 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 以宋学为尚, 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潮流所影响, 这在他的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中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笔者拟从学术与诗歌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 对姚鼐的诗学观点、诗歌创作及其价值作出初步的考察和评价, 以期对乾嘉诗坛生态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但望植学培根柢”: 乾嘉学风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

明末清初时期, 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一大批前代学人认为晚明“性理之学”空疏不实、清谈误国, 倡导“通经学古”“训诂治经”, 以经学济理学之穷, 开始为古学的复兴播扬不惜心力, 这无疑为经史考证学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历史进入清代中叶, 一方面, 乾隆帝重申“首重经学”的家

学传统, 以经学为重要内容考试生员, 职在劝课实学, 反对虚空, “以立士子之根柢”。^[2](卷十七)]另一方面, 为整肃纲纪、维护王朝统治, 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以“文字狱”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禁锢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因之而起的诸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沈德潜《国朝诗别裁》案”“蔡显《闲闲录》案”“李绂诗文案”“王锡侯《字贯》案”一类的冤诬血腥事件接踵而至。为畏难避祸, 士人们埋首于经史古籍的研修之中, 即便是吟诗行文也难免要表现出一定的考据意识。显然, 这一切都为经史考证学的兴盛提供了现实基础, 也使它最终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进入到梁任公所谓的“全盛期”^[3](26-29)], 并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

不可否认, 姚鼐一生以宋学为尚, 但又切切实实地受到了盛炽的经史考证学风的影响。姚鼐成长在经史考证学风兴盛的乾嘉时代, 少小受知于伯父姚范。姚范精专汉学, 方东树甚至称他为桐城“考据之学”的开创者, 在《援鹑堂笔记序》中方氏谓: “桐城学问凡数变, 而为考据之学, 则自董坞先生起。”^[4](卷三)]所著《援鹑堂笔记》更被张舜徽视为“清人笔记中为最精”。^[5](157)]其实, 在时代与伯父的双重影响之下, 姚鼐不愿以区区文章为职志, 不甘心做一个不关世道人心的诗人, 而时时刻刻以学人为模范, 并以书院为基地培植了管同、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姚莹等一大批的以理学见长而又不缺少经世识见的人才。姚鼐重视宋学“义理”, 与汉学之士甚至也有过尖锐的正面

收稿日期: 2014-05-20; 修回日期: 2014-11-25

作者简介: 温世亮(1974-), 男, 江西石城人, 文学博士, 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文学

交锋;但是,他绝非与汉学的经史考证水火不容。首先,对名噪一时、以经世考证见长的戴震,姚鼐即甚为钦服仰慕,其《赠戴东原》一诗中“群士盛衰占硕果,六经明晦望萌芽”云云者^{[6](520)},即是最好的佐证;而据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7](142)},姚鼐甚至还有过拜戴氏为师的愿望。大体而言,姚鼐抨击当时汉学之士的原因,更多是在于他认为琐碎的考证并不切用于世,而希望能调和、吸纳汉宋之优长,以期学为世所用,尝云:“古圣垂教弘且远,六籍具存可说松。……但望植学培根柢,愿捧珠盘譬牛从。”^{[6](415)}其著名的“义理、考证、文章”三分学术说,可以说便是经史考证风气盛行之下的产物,又“直接来自戴震的影响”。^{[8](98-99)}而在他的《惜抱轩文集》“300 余篇文章中,属于考证性质的文章就达 40 余篇。其《笔记》8 卷,《法帖题跋》3 卷,《九经说》17 卷,也基本是考证性著作,对经、史、子、集及金石碑帖中有关与地、年代、职官、名物等诸多方面进行考证,征引较广,文字简练,结论也多正确”^{[9](56)},显示出较为扎实的学问根柢。

实际上,姚鼐对诗歌创作的学养问题也是相当重视的。众所周知,“义理、考证、文章”乃姚鼐的论学宗旨,这一学术宗旨也从他的诗学见解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他曾经指出,“诗文皆须才、学、识三长。”^{[10](卷五十六)}其中之“学”,既指向诗人的学问根基的涵养,又与经史考证相关涉。在《敦拙堂诗集序》一文中,他又称:

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鬼神,反覆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秀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6](49)}

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不仅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相符契,而且也包含着相应的学问成分,是“学术该备”的重要表现,至于《风》诗中那些来源于里巷的俗语是无法与之同日而语的。这种重雅轻俗的观点固然有欠公允,也不符合《诗经》艺术表达的实际,但却将自己重视诗人学问根柢的意识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

同时,姚鼐也非常重视汉学考证对词章的促进作用。吴人王铁夫曾作有《跋惜抱集》一篇,对姚鼐的诗文进行了评价,称他“不甚喜考证之作”。对此,姚鼐却不以为然,并以“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以考证助其文之境,正有佳处,夫何病哉”作回应^{[11](59)},表明了自己对以考证入词章的辩证态度。又,姚鼐反对“近时作诗者”为诗“但求新异”的作风,不但强调诗人应该博览群籍,从中获取良好的学问修养,而且要求创作诗歌的材料应当“于典籍中自为搜伐”,

“不假于《四部稿》《济南集》”,避免从他人书中作贼;“而其间尤要者《左传》《史》《汉》,盖此三书,乃八面受敌者,朝夕精熟,不为为诗,而诗必大进矣”^{[12](622)},由点及面地陈述自己的诗学见识。正因如此,他既赞赏门人管同诗文为“今时中所稀见”,又批评他“微觉腹中书卷,不足济以学问,不可当矣”^{[11](58)},认为学问欠缺是管同诗文难以称佳构的重要原因。对管氏的褒贬,实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姚鼐强调学问在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观点。此外,他还曾告诫弟子陈用光,“凡学诗文事,观览不可以不汛博”,否则就“不堪以为大家”;又以为,杜甫“才多而学博”,所以其诗才呈现出“包涵万象”(卷首《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的面貌^{[13](2)};并进一步指出,后来王士禛《古诗选》之所以不选杜诗,不以杜诗教人,原因正在于王氏自身的学问还不足以真正地去解析、领悟杜诗的精髓所在。^{[11](72)}如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姚鼐对诗歌创作中的学问这一因素,基本上是持积极态度的。

乾嘉时期,“肌理”“格调”“性灵”等诗歌流派纷争,各立门户。但受经史考证学风的影响,他们在对学问与诗歌创作关系的认识上大抵又存在着一定的共识,那就是并不完全否认以考据入诗,即便是以“性灵”为旨归的袁枚也不例外,袁枚实际上也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地排斥经史考证,甚至还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也是可以入诗的。^①

二、“忽窃宝文出禹洞”:姚鼐诗歌创作学问化的表征

姚鼐论诗以“熔铸唐宋”(《与鲍双五书》)为宗旨^{[11](33)},为诗亦能吸唐宋之长,既重视唐诗的丰神情韵,也重视宋诗的筋骨思理,因此,他的诗作也每每显示出清拔刚劲、刚柔并济的风致。不过,诗人的学术思想与其诗学趣尚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诗人的诗学趣尚又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创作实践,姚鼐诗学观点中的学问化倾向也为其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一般而言,古代诗歌的学问化在诗歌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以“学术入诗”和“以学识入诗”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以经史、宗教、哲学、经世、朴学、艺术、诗学等门类;后者则囊括用典、用事、隐括,以及引用前人语句、词语、语意、意象和使用僻字险韵等。^{[14](2-8)}事实上,姚鼐创作诗歌也善于从古籍中挹芳润,他的部分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学问化的表征。具体而言,姚鼐诗学问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考镜源流，在诗作中进行辨析论证。这一类作品在《惜抱轩诗集》中数量并不算很多，主要有卷二《魏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国第译金刚经刻石拓本》、卷三《孔扈约集石鼓残文成诗》、卷五《清华阁帖三卷绍兴御刻皆二王书后有释文余颇辨其误复跋一诗》，以及《惜抱轩诗集·后集》中《铜鼓歌》等少量几篇。具体而言，这些作品，或就《金刚经》拓本的流传加以考辨，或集历代石鼓残文的成说创为诗篇，或对《清华阁帖》的释文的真伪给予勘误，而对名物进行直接的考索论证则成为其最大的特点，虽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养，但也因此具有了明显的“考据诗”的特质。不过，如果就诗学意义而言，这些作品固然具有恃才逞学的缺陷，却也并非完全缺少审美韵致。如《孔扈约集石鼓残文成诗》，便是一篇气势雄浑、意蕴深厚的佳构，徐璈称其“气格浑朴，才力富备，足为韩、苏后劲”^[15]，对此笔者还将在后文作进一步的论析。同时，如果将这些篇章置于考据盛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加以考量，则又足以挖掘出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蕴，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

二是隶事用典，化用古籍章句入诗篇。所谓隶事用典若借用刘勰的话来讲，就是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姚鼐一生嗜学如命，少曾受经于伯父姚范，也从事过《诗经》《周礼》《左传》之类的考订和疏证工作，对经史典籍自然是熟稔于心，所以，其《惜抱轩诗集》中化用古籍章句入诗的例证，无论古体、近体，可谓触处即是。古体如《诗集》中第一首《钱舜举萧翼赚兰亭图》，便多处援用古籍章句，按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16](1-3)}：其中诗句用经籍的有“老僧抵掌僧雏睨，似谓慢藏旁欲谏”——“僧雏睨”“慢藏”分别源于《礼记·中庸》和《易·系辞传》；用史书的有“长有春风流曲水”——“曲水”源自《晋书·束皙传》、“叩门客坐轩槛风”——“轩槛”化用《汉书·朱云传》中语、“石床闭绝昭陵夜”——“石床”取自《南唐书》、“怀璧不可居”——“怀璧”取料《左传》，等等。近体诗也是这样，例如卷六中《徐州》七律一首，或取于《诗经》《山海经》，或取于《汉书》《宋书》，或取于《文选》^{[16](307)}，经史章句的化用，同样甚为繁密。

不过，据《苕楚斋三笔》，姚鼐强调为诗应“不涉陈滥，亦不涉纤僻”^{[12](622)}，并能付诸实践，故其诗隶典用事又具有多取材于正史名篇而不务生僻的特点。如《南朝》是一首七言律诗，八句用六典，分别来源于《西京赋》《三国志》《晋书》《吴志》《通鉴》等。除张衡的《西京赋》系文学作品外，其它均为官修的正史，且多是常见的故实并不见生新的痕迹。如尾联

“销沉转眼愁随主，欲作长城更不能”句，即用《通鉴·唐纪》“武德元年，隋炀帝在江都，知事去，言：‘依不失为长城公。’旋被弑”事^{[16](298)}；而《效西昆体四首》^{[16](277)}，诗人更是使尽用事之能，无句不出典，足可与西昆作者相比肩；但是在取材上，大抵也没有溢出正史名篇的范围。

三是辨章学术，就史学、佛学、诗学等进行论述。姚鼐重视诗人的史学修养，《惜抱轩诗集》中的一些作品便是径直取材于史乘，进而生发议论和抒情的。如卷一《读史》《咏史》《秦帝卷衣曲》《咏七国》，卷五《书乐志论后》，卷六《汉宫辞》《清宫辞》《南朝》《淮阴钓台》，卷八《雄县咏周世宗》《平原咏东方生》，卷十《南唐》《题韩魏公早朝像》等，发表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均从读史中来。另外，姚鼐一生耽于释氏，而晚岁尤甚。卷十《慧居寺》《鹫峰寺》《葆光寺》《报恩寺》等诗篇，均作于他晚年讲席金陵钟山书院时，诗中留存下“佞佛媚道”的印痕也就在所难免了^{[11](4)}。如《舟中望板子几以南山势甚奇因题长句》“山中犹未识山好，正坐一障藏千重”、《鹫峰寺》“银杏风前活，金容世外尊”、《葆光寺》“一径通修竹，高低杳霭间”等诗句，无不在言辞中渗入顿悟意识，同时又显出几分理性思辨。实际上，这些作品只不过是作者在经历了人生困惑之后对佛学禅理作出的一种诗性阐发而已。另外，《惜抱轩诗集》中也有许多论诗之作，对古今之诗风、诗法、诗作等展开具体的品评和议论。如卷三《赠钱思鲁》、卷四《题合箫楼稿》和《与张荷塘论诗》、卷五《夜读》和《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卷九《次韵答毛学博》，等等。除上述外，在诗中发表汉宋学术见解也是“惜抱轩诗”的应有之义。如卷二《述怀》“门有吴越士”一首，徐璈认为姚鼐“不抑宋尊汉本末，具见于此”。^[15]而卷一《漫咏三首》感喟儒术的演变历程，卷五《题外甥马器之校经图》阐发宋儒的义理，均属于类似之作。

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朱筠，曾作《长句赠姚稽川用王禹卿韵》一诗，以评姚鼐其人、其诗，其中有句云：“有时放意恣怪奇，忽窃宝文出禹洞。”^[17]称叹惜抱之诗古博高深、变幻莫测，学识淹贯其中。由前文论述可知，朱氏的评鹭是值得肯定的，应该说较为贴切地概括了姚鼐诗歌创作所具有的以学运诗的特点。

三、“儒者气象”：姚鼐诗歌理论及创作学问化的审美内蕴

实际上，姚鼐为诗非常重视情韵，并不看好那些

发露之词。他在《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中便指出：“盛唐人禅也，太白则仙也。于律体中以飞动票姚之势，运旷远奇逸之思，此独成一境者。”继而又称：“中唐大历诸贤，尤刻意于五律，其体实宗王孟，气则弱矣，而韵犹存。”^{[13](2)}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以“义理”作为中心而构建的“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观点^{[6](49)}，又是姚鼐文学创作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审美旨趣所在，所以，他对那些无益于事的琐碎考辨是极力反对的。因此，以学问入诗自非他真正的目的，更多的是欲借它来“助文之境”，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弟子陈用光所说的“以考证入词章，词章乃益茂美”（《复宾之书》）。^{[18](卷五)}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不妨再来读一读《惜抱轩诗集》卷三《赠钱鲁思》一首：

信古方能见性情，遗今谁得加荣辱。世间口说何纷纷，未知天意于斯文。凤凰五色偶鸣和，麒麟一角方超群。

在姚鼐的意识中，“古”既指古代和古代的典籍，也指古人的诗学传统和诗学方法。此诗自然包含着其为诗当向古人学习，当于拟古入手以求脱化、求“性情”的理念；不过，“性情”又与“荣辱”相对应，不仅显示了其贯“义理”于诗歌创作的鹄的，也将其积极的事功意识传达出来；至于结末“凤凰五色偶鸣和，麒麟一角方超群”句，则宕开一笔，再次隐曲地将以学问助诗境这一深层含义表现出来。在《与陈硕士》一书中，姚鼐对这一理路的表达就更见明白了，他说：

大抵好文字，亦须好题目然后发。积学用功，以俟一旦兴会精神之至，虽古名家，亦不过如此而已。^{[11](54)}

显然，“积学”的目的在于求“兴会”和“精神”。“积学”乃学诗的途辙，指向诗人的学问积累和学问的渊博；“兴会”和“精神”则为诗歌创作的深层目的，涉及诗歌的审美意境和社会内涵。将三者聚合于一处，由表而及里，从过程到结果，姚鼐的诗学崇尚或者说诗学追求是再清楚不过了。在致学生鲍桂星的一封信中，姚鼐俨然将翁方纲、袁枚视为“诗家之恶派”^{[11](33)}，这种见解的提出，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翁氏以学术考证为诗从而汨没诗歌的艺术兴味和精神内涵；而袁氏论诗刻意强调性灵，于考证、义理则不予重视，必然导致诗歌的轻佻、世俗化。可见，无论是翁方纲还是袁枚，他们的诗学观点都与姚鼐所持的“积学用功，以俟一旦兴会精神之至”的追求，存在着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姚鼐的诗学见解实有其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那么，姚鼐有没有将以学问为途径、以情韵意境为旨归的理论见解，深入地贯彻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呢？

答案是肯定的，吴汝纶序《惜抱轩诗集训纂》所

谓的“先生（按：此指姚鼐）诗勿问何体，罔不深古雅健，耐人寻绎。彼自谓才薄，观于诗殊不然”^{[16](2)}，实可作它的注脚。就实际而言，在《惜抱轩诗集》中，这样的例子也并不为少数，如前文论及的《孔撝约集石鼓残文成诗》即是。为便理解，谨再举几例：

卷一《咏古》五首是一组五言古风，诸如《史记》《左传》《国语》《汉书》等中的故实，《楚辞》《周礼》《上林赋》等中的章句散见于诗歌中^{[16](267-277)}，作者的学问功深实见之于笔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姚鼐搜佚著笔于史实典籍的真正目的却在于借古以讽今。对此，钱仲联先生作出了非常明晰的阐释，他分别指出：第二首“汉庭策贤良，褒然儒董生”句以“武帝即位，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书董·仲舒传》）借指康熙设博学鸿词科，“如何桑与孔，贾竖充簪纓”句则以武帝任用桑弘羊、孔仅为公卿事借指康熙发展经济，具有歌咏康乾盛世的深层意思；第三首借汉武帝发浩歌事，反对康熙、乾隆皇帝游山玩水；第四首借汉代内使兒宽、酷吏张汤事，隐指清王朝之苛政和百姓沉重的负担；第五首用汉武帝攻打西域事，反对乾隆皇帝对少数民族的侵犯。^{[19](46)}由钱先生的阐释可知，含而不露，寄托遥深，融学于诗，实是《咏古》这一组诗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正因如此，像这样的诗篇，如果没有足够的学识，又不细加品读，是很难理解其个中真意的。

卷六《古意》是一首七言律诗，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姚鼐会试落第后闲居于京城之时，诗云：

青柳高楼白马驹，五陵春醉酒家胡。君家新市长安少，臣里佳人楚国无。在下愿为莞蒹席，与郎依作博山炉。东风门外蘼芜晚，更折瑶华向路隅。

诗作运用“五陵”“酒家胡”“新市长安”“莞蒹席”“博山炉”“蘼芜”“瑶华”等一系列古人语词、章句或意象^{[16](8-11)}，委婉地传达了自己壮志难酬、知己难求的深衷隐曲，表现出对偶工整，韵律规范，以“香草美人”喻愁情的艺术特点。徐璈称其“体格仿沈云卿，用意则本之渊明《闲情赋》”^[15]，实乃当行之评。

卷八《哭鱼门》，乃深悼亡友程晋芳而作，诗云：

遇君通籍已华颠，犹见雄才赋百篇。送别联元亮井，论文曾许伯牙弦。十年《白虎》成通论，几日扬乌与《太玄》。一入崑函身不返，空闻解绂买江船。

程晋芳曾师事于刘大櫆，与姚鼐有同门之谊；又与姚鼐同时入选四库馆为纂修官，曾“作《正学论》，力诋颜李，并驳戴震，大为程朱辨冤”^{[20](1007)}，是姚鼐学术上的同道，彼此相知相识几十年，堪称知己。诗写程晋芳的早达晚遇和雄才大略，追忆往昔的相濡以沫。从句中加点词来看，诗作无处不用典，无事不

用典，深切的哀悼之情也藉此得以宣示。此诗虽然典实运用密集，但是并没有破坏诗歌凝练雅致的特质，情词却更见含蕴真切，相对于那些直抒胸臆、感情直露的悼念之作显然要胜出一筹。

不可否认，姚鼐善于以“古文之法”作诗，其诗也确实具备了“文人之诗”的特质，前代学者亦多以此相论衡。但是从整体而言，他的诗歌作品往往能够合“学人之诗”“文人之诗”为一，不但呈现出融学术、学识于其中的表征，而且不乏义理的阐发，也显示出含蕴深沉的艺术境界，甚至还融合、凝聚了历史、社会、现实之类的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义理”“考证”和“词章”的统一。晚近徐世昌编纂《晚晴簃诗汇》，谓姚范诗“导源义山而别蹊径，实与昆体不同，亦无宋人粗劲之习”^{[21](卷七十七)}，大致称姚范的诗歌能熔唐铸宋，蕴蓄学殖而文采思韵淹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姚范从子和学生的姚鼐，实得其真传，故借徐氏之言来评姚鼐之诗，也无不可。而作为私淑弟子的曾国藩，更是称姚鼐“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16](298)}而要成为“儒者”，不仅需要拥有精深的学问修养，还必须具备涵容博大的道义气度。惟其如此，大致可言，曾氏实从学术旨趣、艺术兴味、精神内涵等多角度对姚鼐诗歌所具有的审美特质作出了更为全面的评价，既阐述了姚鼐身上所具有的儒者操守，又揭示了姚鼐诗歌所包涵的学人素养和文人气质，相较于那些评鹭姚鼐诗歌仅以“文人之诗”相衡定的见解而言，自然显得更为客观和贴切。而从前文可知，借助于学问、义理、词章的融通结合来实现诗歌创作的“儒家气象”，正是姚鼐的审美追求所在，在此曾国藩只不过是做了他的代言人而已。

四、结语

中国古典诗歌学问化的特征渊源有自，春秋时期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魏晋时期刘勰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文心雕龙·深思》）、陆机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文赋》），可以说都是其理论之先导。至赵宋王朝，诗歌更是呈现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的特点。姚鼐诗歌理论及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应该说既与传统诗学的影响密切相关，也跟当时昌明的经史考证学风不无联系，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洪亮吉对乾嘉诗坛的诗意概括（见前文所引诗句）。正因如此，姚鼐诗歌理论及创作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我们至少可从诗

学、学术、文化等几个层面进行挖掘。

其一，助诗歌之境界。诚如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孔尚任所言：“词中所用典故，信手拈来，不露钁钉堆砌之痕，化腐为新，易板为活。”^[22]诗歌的学问化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典故用得恰当，往往能使作品显得更加典雅厚重、含蓄深沉。姚鼐显然是一个晓识如何运用学问为诗的歌者；所以，他并没有一味地掇摭、补假诗料于典籍，而能以“兴会”和“精神”为目标，以“积学”为途辙，谋篇布局。因此，他的作品并不流于钁钉堆砌，也没有留下多少被人诟病的把柄，却能于学术、学识的娴熟运用中营构内涵丰富的境界，善于将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结合起来，显示出其私淑弟子曾国藩所谓的“儒者气象”，成为“桐城派”诗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也因此受到后来晚清诸如同光诗家沈曾植、陈三立、陈衍等人的大力扬誉。大体而言，在“学问为诗”这一点上，姚鼐是成功的，甚至在启一派乃至一代诗风中具有筌路蓝缕之功；而他的成功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学问在古典诗歌创作中所占据的地位是勿容轻忽的。

其二，疏诗坛之榛塞。受乾嘉经世考证学风的影响，乾嘉诗坛呈现出或一味强调学问根柢而失却艺术情致、或过分追求经史考证而落入泥古因袭、或肆意追求性情张扬而趋于世俗轻浮等不良倾向。总之，乾嘉诗坛，无论是“肌理”说、“格调”说，还是“性灵”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艺术兴味和精神境界不高的局限。作为姚鼐的论诗宗旨的“熔铸唐宋”，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上，与那种不良的诗学风格格不入。它的实质在于要将唐诗的“丰神情韵”与宋诗的“筋骨思理”熔于一炉，要将性情与志向、学问与兴会、学识与精神等融而为一，使诗歌创作上升到更高的思想层面，以真正实现它的人文价值。为此，姚鼐尝几十年如一日地编纂、修订《今体诗钞》，辑选唐宋诗于一书而不偏执一端，并将它作为诗家的“正法眼藏”^{[11](23)}，以改变当时“诗家大为榛塞”的局面^{[11](23)}，欲为当时的诗歌创作指明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概而言之，无论是“熔铸唐宋”这一诗学观点，还是《今体诗钞》的编撰意图，与姚鼐诗歌理论及创作的学问化均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彼此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有其一致的背景基础，共同彰显出其正诗坛流弊的胆识和胸襟。惟其如此，我们又可以之作为问题的生发点或者重要个案，选择一个贴切的视角，对乾嘉诗坛所具有的融学于诗、诗歌与学术交织的现象作进一步的研究。

其三，正学者之路径。姚鼐以“以俗体诗之陋，钞此为学者正路耳”作为自己编撰《今体诗钞》的目

标所在^{[11][66]},于此可知,他编撰《今体诗钞》的终极追求并非诗学而在于学术。结合前文的论述,我们还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议题:姚鼐诗学宗旨的形成,虽然与正统的儒家诗教相适应,但又离不开当时学术风向的鼓荡,他的诗学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弘扬宋学义理的学术旨趣的基础上,是以其学术旨趣为服务对象的。也就是说,姚鼐正是在以学人的身份筹划他的诗学见解,又借助诗学的探讨来实践、推广自己的学术主张,以实现文学有益于世的功能。虽然,这还只是一个个案而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是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下甚至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祈尚,带有韩愈那种“馀事作诗人”气识的文士在乾嘉时期并不少见,他们的学术旨趣也不尽统一,汉、宋之别便是一例,但借助文学这一载体来阐发推行他们的学术主张的目的却是相似的。当然,这与康熙以来清代帝王推行的“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的文治策略又是脱不了干系的。如果从这些层面理解,姚鼐的诗论及创作的学问化显然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解读意义。只是,要全面、客观地解决这一问题,则还需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总而言之,姚鼐具有学人、诗人的双重身份,而且又生活在经史考证盛炽的乾嘉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因此,将姚鼐的诗歌理论及创作置于相应的学术背景中加以考察便成为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要。毕竟,这一处理方式更易于贴近姚鼐的诗歌理论及创作的实际,有利于对其作出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而循着这一思路去探讨乾嘉时期的诗坛现象,也是切实可行的。

注释:

-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宁夏、魏中林《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 洪亮吉.更生斋诗集[M].清光绪阳湖授经堂校刊本.
- [2] 清高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4]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 [5]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6]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7] 戴震.戴震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J].文学遗产,2014(1):98-99.
- [9] 刘守安.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56.
- [10]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M].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 [11] 姚鼐.姚惜抱尺牍[M].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
- [12] 刘声木.蓑楚斋三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3] 姚鼐.今体诗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4] 宁夏江.晚清学人之诗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 [15] 徐璈.桐旧集(卷七)[M].民国十六年影印本.
- [16] 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M].合肥:黄山书社,2001.
- [17] 朱筠.笥河诗集(卷三)[M].清嘉庆九年朱珪椒华吟舫刻本.
- [18] 陈用光.太乙舟文集[M].清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刻本.
- [19] 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 [20] 胡适.胡适学术论文集(下)[M].上海:中华书局,1991.
- [2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Z].民国退耕堂刻本.
- [22] 孔尚任.桃花扇凡例[C]//桃花扇(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Yao Nai's poetic theory and creation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spective

WEN Shi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Scholar poet Yao Nai, who advocated Song learning which emphasized argumentation first, could not be excused from the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Qianjia period. His poetic theory and knowledge tendency expressed by his creations can be seen as the best proof of the phenomenon. However,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is on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Yao Nai's poetic theory and creation, and the essence lies in inspiration and spirit. Yao Nai's poetic theory and creation and the value of his knowledge tendency can be explored from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poetry, academy and culture, and can also be embodied by uplifting the realm of poetry, dredging the obstruction in poetic circle, righting the pathway for scholars, and so on.

Key Words: Yao Nai;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of Qianjia period; poetic theory; poetic creation; knowledge tendency

[编辑: 胡兴华]